

坦克猫 No.02

导言

“From your 136 subscriptions, over the last 30 days you read 635 items, clicked 21 items, starred 0 items, shared 44 items, and emailed 0 items.”——来自我 Google Reader Trends 的数据。

我订阅了 136 个 RSS 源，它们每天的更新量大约在 80-100 篇网文，如果再包含从这些更新的网文中引申的链接，那么我大概每月要“过滤” 3000 篇左右的文章，粗读其中的 600 余篇。除此之外我每月还要读 8-10 本书。

读了这些，有很多时候，我也自己提笔想写一些。然而每到这时，我又常常感到自己不能比某一篇我读过的文章讲得更好。

比如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恰好又是我今天看到的[西闪](#)这篇《[风险中的“冲浪者”](#)》中谈到的：

“凯恩斯道出了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事实——观念是一种稀缺产品。它像电脑程序的源代码，少数人创造，一些人传播，多数人共享。……哈耶克也赞同凯恩斯的观点。他除了引用这位学术对手的原话之外，还特别强调：“长远来看，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从每月读过的东西里选出一部分，构成一份网摘——它的关键词包含：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以及敏感词。

我愿望所有读这份网摘的人，终一天合力使我们的孩子不再重复我们此时的苦难。

—— 2010.08.26

目录

导言.....	2
目录.....	3
石扉客：专访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访谈）.....	4
林培瑞：中国：吊灯里的巨蟒（社会）.....	12
冉云飞：哀悼不是表演（社会）.....	17
刘瑜：告别印象主义（杂谈）.....	18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21世纪的民主本能（政治）.....	20

石扉客：专访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访谈）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64698.aspx>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他的中文老师是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而他自己完成了哈佛的本科和硕士学业后，又师从美国汉学顶级权威费正清教授，拿到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研究的居然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他同时还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第一位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位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的洋人。

尽管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的国语会标准到如此程度，对这后面两个第一，这个65岁的老头儿仍然很谦虚地表示，要在前面加上“可能”二字。而说起学中文的动机，他会让你觉得至少在语言领域里绝对是有常人望尘莫及的天才。在一次采访中，林培瑞谈到，仅仅是因为第二语言选修法文时，觉得太过容易，想再修一门难一点的语言，于是他就选择了中文这门全世界老外都公认最难学的语言

其实这种兴趣也和家世有关。林培瑞在纽约州长大，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强烈兴趣的美国人，而林本人则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太太。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的办公室也设置得古色古香，甚至可以拍电影，《美丽心灵》就曾在那里拍摄部分背景。

2010年4月2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校园里，趁他前来参加普林斯顿世界汉语教学年会的与会间隙，本刊记者得以专访了这位年逾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国通”。

在2个小时的采访中，林培瑞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时不时地娴熟地运用着诸如“死猪不怕开水烫”之类的中国俚语，外带几分看上去有几分狡黠的笑容。一旦说到他为之安身立命的中国问题，说到他那些为之梦魂萦绕的中国好朋友们，他的神色中又会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关切与伤感。

在耶鲁大学的华人学者苏炜看来，在他教过的耶鲁学生里，“从最早由林培瑞编译出版的《伤痕文学小说选》，到纪录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风貌的《北京夜话》，一直到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研究文集，都是美国大学修读东亚学位学生的必读书目。”

除此之外，林培瑞也曾深度介入到中美关系的历史风云里。在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时代里，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的中文翻译；在80年代中美关系蜜月里，他又担任过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在六四事件中，他把方励之和李淑贤带到美国使馆避难。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对中国社会的真切观察与了解，对中国和华人命运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使得他维下了众多同样以赤诚对他的海内外中国好友，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以及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又为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的美丽小镇里，还是在加州大学的河滨校园，林培瑞都始终没有停止

过对 中国的持续观察和中国问题的敏锐思考。“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苏炜于是评判他与中国的关系。

林培瑞访谈：

一、 韩寒和王朔

南都周刊：您最早是研究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这些小说的场景地主要是在上海。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同样在上海，出现了以卫慧、绵绵等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宝贝》等“美女作家”派小说。这两个派别之间有无传承和勾连？

林培瑞：首先一点区别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字要比“上海宝贝”们雅致得多。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鸳蝴派用的是桐城派式的文言文来写作。另外鸳鸯蝴蝶派基本都是男的，虽然他们也有几个妇女杂志，但也是男作家在打理。“上海宝贝”们好像都是清一色的女作家。第三点不同是鸳蝴派从来没有“身体写作”的说法，甚至中国古代色情小说都没达到“身体写作”。

但这两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通俗文学还是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鸳蝴派的爱情故事常常有三角形的结构，两个女配角代表新女性和传统女性，男主角喜欢和代表西方的新女性打交道，冒险新的文化，但最后还是和代表东方的传统女性结婚。传统女性比较平淡，甚至乏味，但毕竟靠得住，不代表任何冒险或威胁。在卫慧的小说里也是一样，但主角换成了女的，两个男配角里，马克有几分性感野蛮，代表西方口味；另外那个中国男的呢，文绉绉的，性能力一般，代表传统的中国好男人。从 20 世纪 10 年代到 90 年代的上海，变化固然多，但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通过“洋对象”和“土对象”的对比来评估两种生活方式的长短处。

南都周刊：上海还有一位年纪和您差不多的老作家沙叶新，他在 80 年代的很多剧作非常有名。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和他在中国的影响？

林培瑞：我先认识他的作品，后认识他的人。1979 年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校园里公开演过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后来我编的小说集《倔强的草》(Stubborn Weeds)也收入了这出戏的英文译文。1980 年我到上海访问时，曾经向当地作协提出来和沙叶新见面，人家说“不方便”，很可惜。再过几年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

沙叶新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当代作家。除了他的剧本，近几年来他留给的最深印象是在 2006 年他写的一篇文章《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一句，在分析 2004 年的万州事件时，沙问，“怎么可能原先是鸡毛蒜皮大的事情而居然会刺激三万老百姓的愤怒？是什么使得官民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敌对心理如此普遍？”这问题是问到点子上，极好。

南都周刊：同样是在上海，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里，韩寒在大陆网民中有非常大的号召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这个八零后青年？

林培瑞：韩寒我看过他的博客，很喜欢他，也是个人才，语言不华丽但是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而且能点到敏感东西，不一定碰到，但是擦边球打得很准，能让很多百姓解气。我记得他在《时代周刊》上大概这么说过“我不一定很有影响力，但我能为很多人解气”，

他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很多看法不需要透彻地说出来，我的作用是给他们发泄的机会”，很对。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点击率那么高，而且人很聪明。

南都周刊：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按照《时代周刊》的报导，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您怎么看待这位同行的看法？

林培瑞：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韩寒跟共产党有“默契”吗？韩寒损政府的那么多方面，包括敏感问题（比如最近的福建三网民事件），点击率又那么高，难以置信官方会欢迎甚至跟他建立“默契”。假设说有默契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五毛党”出来批评韩寒，批评“时代周刊”给韩寒提名最有影响力的人？要是有人跟共产党有这种“默契”，那我觉得应该说是“新左派”。刘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就有不少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新左派的声音，有些问题上刘禾自己的声音也属于“新左”。

南都周刊：以您的观察，韩寒这种写作方式有无可能带动当下中国社会情绪的发酵，有没有可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大众引领作用？

林培瑞：有关方面也许会不喜欢他，但是有那么多人跟随他，比较难办。我想韩寒和以往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点上是不一样的，以前的那些公知名气虽然也很大，但是只限于知识界。不像韩寒，粉丝跨越了社会不同阶层。打压韩寒的话会激起更大的民间反应，我想政府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羡慕他的人那么多，打压代价会很大。

南都周刊：如果有机会碰到韩寒，您想跟他说一些什么？

林培瑞：主要是问他问题，关于中国近况和将来的问题，因我这十多年没去过中国，很想听听老百姓的想法，尤其是价值观，相信什么希望什么，老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是死了，除非为了利益去参与它的话语体制，但真正内心深处的，私下朋友间的价值观是什么？

从表面看，中国的价值不外于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传统的“怎么做？”“怎么样才对别人负责？”等等道德观，我不相信就消灭了，很多地方还有痕迹，比如各种宗教的反弹。中国老百姓似乎想认同一个日常生活里正常的人的价值观，比如电视剧《士兵突击》里主人公许三多就是个好人，出名、有钱、帅都不是，但观众好像很愿意认同他，因为他老实，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里还是喜欢老实人。

韩寒的博客文章很损，但是损之下有价值，古今中外讽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价值观在里面。王朔作品也很损，有次他来纽约我跟他喝茶，我问他你的底线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他不愿意说，我也不怪他。但比起王朔，我觉得韩寒底子里比较明显有些积极的价值观。

南都周刊：2006年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经夸过王朔的语言好、活泼真实、有感染力。您刚才也说到韩寒的博客很损，语言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有观点认为王朔和韩寒这两代青年（也许中间还有王小波），有某种传承关系。您怎么看？

林培瑞：关于韩寒和王朔，韩寒更愿意打擦边球，但至少他愿意去擦球，而王朔的讽刺则更一般性，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喜欢用典型人物说典型官话，让读者自己去分析，但

他就是不去点明。韩寒不一样，比如他最近的博文提到福建三个网民被判的事情，虽然也没点明，还是打擦边球，但他说了个具体东西，大家知道他说了什么，这方面他超过了王朔的抵抗价值。所以相比较而言王朔是更抽象的，小说里的人物事情有影子，但毕竟是影子，没有具体东西。再比如韩寒最近写世博会，记者采访他，这未必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很具体，也不是影子。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王小波的小说和随笔，抱歉，我觉得我看得不够，谈不出有价值的看法。

南都周刊：您刚才提到《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您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甚至追捧，是他们在寄托这种中国文化里的传统价值观？渴望这种价值观的回归？

林培瑞：我感兴趣的是许三多这个人物为什么观众会认同。他不是生活模范，但观众显然同情他的朴素，甚至认同他。为什么？他不代表奥运会，民族主义，物质主义，等等。他几乎相反。有人说是对官方价值观的反叛背离，我不敢那么说。我认为是追求传统和普适的价值观。不一定高尚到哪儿去，君子行为，等等。我觉得只是普通价值：做人要诚实，要说真话，中肯地对待别人。许三多代表的就是这些价值观。他人长得不漂亮，没有女朋友，没有大事业，没有钱。他只有他的气节，他的朴素，他的耐力。他在观众面前那么受欢迎说明什么？说明观众向往这种价值观。

中国读者以前也用过文学作品来寄托自己的价值观。比如伤痕文学时期，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也是个很清楚的例子。王守信的案子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发表过，宾雁的贡献是把细节写出来，明锐地分析贪污腐败过程。老百姓已经知道中国社会充满了腐败，用不着宾雁告诉他们。但宾雁把细节和道德角度写得那么清楚，有胆子把它发表，就获取了大量读者的同情和认同。宾雁写了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全国人写信说，你其实写了我们这地方的事情，老百姓追求并看中了诚实（honesty）这种普通价值的反应，用刘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追求和不满。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韩寒的博客也起了这种作用。

南都周刊：这几年里，除了韩寒和《士兵突击》之外，您关注和喜欢过的大陆作家以及电影、电视剧，是哪些？

林培瑞：总的来说，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老舍，沈从文，吴组缃，闻一多，萧红，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刘宾雁，高晓生，阿城，格非，胡发云。肯定还有一些我一时不记得。另外，哈金（雪飞）我也很喜欢，他虽然写英文不写中文，但写中国人的内心生活也是一流的。

这几年的阅读视野里，除了韩寒，我还喜欢胡发云，杨继绳，胡写的《如焉.com》，杨写大饥荒的《墓碑》，美国文学界已经有人在组织翻译，据我所知，胡发云的《如焉.com》已经翻了一半，杨继绳的《墓碑》也已经翻了一部分。至于韩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有网站在介绍并翻译他的博客，我不知道到能否出一个集子。章诒和的也不错，不过我没有都看，她回顾五十年代的 那些也挺好。

贾平凹的在《废都》后我看得不多。《盛世》这种政治幻想小说我听说了，我太太找到了书，还没来得及看。

电影最有印象的是《色戒》，删减的和原本的两个版本，我各看了一次，删节本我看了觉得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结局。因为它把色情部分取消了，我没看到做爱的关系的建立，第二次看才理解了，这就是剪辑的代价。不能说看不懂，但删节一部分影响全面的理解。

另外，我前几天晚上在网上看了一部分《老妈蹄花》，也觉得也很好。我上学期教过中国人权历史的课，晚清到现在，大部分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问题。可惜《老妈蹄花》没有字幕，不然可以用来教学，因为很说明问题。

南都周刊：《色戒》在大陆上映后，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知道您怎么看待？

林培瑞：我看到了，主要反应是那些表面和皮毛的东西。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冷静地看汉奸问题，当时住在沦陷区里确实有很多人跟日本妥协，这是历史事实，现在很多百姓也跟共产党妥协，受他的气，合作。张爱玲和胡兰成也有他们的政治背景，不是说张写得都“客观”，但是那种对小说和电影流于表面和肤浅的批评就很可怕。

（二）、过去和现在

南都周刊：在中国网民们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作协养着的专业作家，其形象已经很难说有道德感召力。2006年接受本刊采访时，您也曾提到中国作家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点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近几年来比较少见。你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个看法？

林培瑞：80年代的作家扮演的角色比较可爱。80年代末期以后到现在比较让人失望。但这个问题难以一概而论，总有例外，比如胡发云，韩寒。

南都周刊：2009年9月，您在河滨分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对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群体和青年一代一切向钱看的气氛表达了深切的失望。您80年代在中国的经历后来写成了那本着名的《北京夜话》，一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许知远前不久评价这本书时，感叹“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书中的气氛却恍然隔世。知识分子早已沦为社会的边缘力量，没人再关心他们的谈论，他们也再没有兴趣谈论。当年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早已变成一种普遍的狂欢、冷感和嘲讽。”您是否同意这些看法？

林培瑞：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北京夜话”不能代表今日中国，只能视为历史书，描写80年代后的气氛，尤其是八七年到八九年那种知识分子的气氛——关心国家、社会；谈理想啊，我们国家怎么能够改进哪。

大致上说，九零年代以来的年轻人是有变化的。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都是抱着理想的，这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可是在最近这一代青年的身上有时候很难找这个东西。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受教育的这一代，的确感到失望。

当然，我不愿意百分之百地说今日的知识分子没有理想主义，也有。前述的胡发云和杨继绳是例子。许多维权律师，想说真话的新闻记者，环保“积极分子”等等都是例子。与80年代比，今日的知识分子的表现比较糟糕是程度问题，不是绝对的。

南都周刊：您能否展开一点地说您对今日年轻知识分子的“失望”？是根据什么做出的？

林培瑞：这15年来，我观察的主要是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当然有例外，但大致上说，这些研究生，与历代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不谈社会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中国不民主和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愿意认同共产党培养的那种（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看到这些我的确感到失望。

举个例子：去年在一个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位中国研究生。她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念书，人显然很聪明。是官方派的学生，算“体制内”的。关于民主的问题，她说她认为中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现在实行民主会乱套，要等几年，或几十年，才能实行民主。

我问她：要是中南海明天宣布要立刻实行民主，你会不会站出来说“不对，条件是不成熟的，政府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我的用意是想测验她的“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的根据是什么。是她自己的研究成果吗？还是配合官方的说法而已？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到底有多少？

她听我的问题一愣，显得有点难为情。我觉得她明白了我的问题的用意。她说“这个问题不好答，我过几天再答复你，好不好？”过几天我又问了，她说“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民主当然是好的，中国早晚要实行民主。”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只好问自己：这个学生到底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我觉得她了解。但她追求的不是独立思考，是自己的利益，说她那一套表层的话是为了爬梯子。我理解她，但比起往年的有理想的中国青年，只好说是代表了一种令人遗憾的退步。

南都周刊：就目前而言，你是否觉得这种延续了 20 年的趋势有逐渐变化的苗头？您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 Andy 先生曾经在 2002 年时写过一篇《威权体制的韧性》，为这个体制延续到现在提供了一个理论探讨的分析框架，您如何看待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的看法？

林培瑞：Andy 兄的分析没错，比起毛时代和 80 年代，原来的意识形态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而利益集团的内在运转更“制度化”，现在的大大哥也不太可能像今天的北韩那样搞“一个人说了算”的大独裁，更多的成为官僚阶层的傀儡，或者叫一个大利益集团的特使。

但这个模式的‘稳定性’到底多大？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心没有 Andy 那么强。我觉得不一定很稳定，我猜想利益集团自己也不认为是那么稳定的，否则何须把他们累积的财富拼命往外运输？我们南加州就有许多阔房子，里头住着年轻的“二奶”。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语言学专家，您多次提到官方语言和非官方语言的区别，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是怎样调整自己去适应官方正统的要求。您还专门论述了中国正式的官方语言和日常用语之间的区别，以及官方语言对民众语言的压迫与侵犯。您甚至觉得五言、七言等中文里的节奏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让叙述者的口气变得更权威、更崇高。想请教您的是，现在中国大陆网民贡献了无数才华横溢的网络语言，比如草泥马、河蟹、马勒隔壁等，有评论认为这种网络语言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民众语言对官方语言的反抗，对正统的意识形态也起到了解构作用。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如何评价？是否会将这些新型网络语言也放进您的中文教学课堂？

林培瑞：网络语言是中国语言的一部分。等我的学生有一定的中文底子以后，我愿意介绍网络语言给他们认识。一般地来说，美国学生很喜欢学这种语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创办“孔子学院”，想通过语言教学来影响各国年轻人的思想，尤其对中国政治的思想。我猜想这个事业不会那么顺利地达到它所希望的效果，因为西方学生很喜欢唱反调。掌握了基本中文以后，他们会很喜欢“草泥马”，“河蟹”这种语言，同时会觉得官方的那种‘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之类的官腔很没意思。

（三）、文学和政治

南都周刊：《零八宪章》事件中刘晓波被捕后，您在纽约书评上曾经撰文提到过崔卫平

对作家们的电话拷问。这些拷问的对象似乎以 80 年代的文化人为主，我注意到 莫言、张颐武等的回答都很有意思。您同样在《吊灯里的巨蟒》这篇文章里提到过体制制造的恐怖导致个体的自我审查问题。我想问的是，以您的观察，这种自我审查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作家们的创作自由？这种自我审查，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至今三十年间，有无一个变化的曲线？

林培瑞：至少莫言的回答很显然是一种自我审查。我很佩服哈维尔的一个提法：“Living in Truth” (活于真理之中)，大概意思就是“我要说真话，有没有代价是次要的，说真话本身给了我一种最可贵的自由”我并不想刻意批评中国作家，我知道在 这种体制里 Living in Truth 很难做到。但胡发云的《如焉.com》就相当接近哈维尔说的这个意思了，刘宾雁的许多作品也接近，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文字风格也接近。

关于自我审查的影响的程度，只能说或大或小，每个个体承受的程度不一样，甚至包括海外的汉学家。实际上我那篇《吊灯里的巨蟒》，主要就是针对包括我在内的汉 学家们的自我审查而言的。

在中国，我觉得 80 年代的自我审查界线比较模糊，现在更清楚。比如 83 年官方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老百姓就得开始摸索：到底什么叫“污染”？我唱香港歌曲算吗？留长头发算吗？多长才算？等等。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当然 更麻烦。结果见绳怕蛇，自我审查的范围弄得很广，有时候甚至不必要的广。可是现在界线清楚的多。比如六四、达赖喇嘛，新疆问题，台独问题，法轮功，高层领导腐败问题，大跃进大饥荒与毛时代其它的灾难等等禁区都十分清楚。只要绕开这些题目，紧张的气氛就不像过去那么大。一般的老百姓只要不碰这些，怎么吃饭喝酒唱歌跳舞都行。

南都周刊：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比如金介甫认为，“西方吹捧中国新时期文学者，注重的是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优点而不是艺术的优点，这无意中低估了它的价值。整个 80 年代，中国文学呈现越来越丰富、创作活力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林培瑞、杜迈 克、萧凤霞以及他们的同行们着重的是回顾。从未有一种文学能像新时期文学那样，带头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论争，在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里，林培瑞强 调的政治与艺术的平衡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些话？我理解，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分看重文学作品的政治色彩，又会导致对其艺术性理解的偏差？

林培瑞：金介甫是我的老同学兼老朋友，但我理解政治和艺术不是对立的，在伟大的作品里我觉得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鲁迅的小说是很清楚的例子。鲁迅关心“政治”吗？包括国家和国民性？绝对关心！同时，鲁迅的作品有没有艺术成分？绝对有，而且是极高的程度。请问，“矛盾”在哪儿？不但没有矛盾，两个因素（政治和艺术）互相支持。俄罗斯的大作家，托 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尼普、索尔仁尼琴也都是好例子。关键是所谓“政治”的来源是什么？只要来源是作家自己的良心，那多少“政治”都没有问题。中国毛时代的“政治”之所以闯艺术祸是因为政治的来源不是作家的良心，而是“伟大领袖”的命令。

我喜欢高晓声的小说，比如《鱼钩》、《钱包》等短篇，看上去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但潜在的意义是一些人性问题与社会问题，包括一些让读者想到“文革”时代 的离奇的事情。要是这种问题属于“政治”的话，那我就得说我赞成小说里头有政治。我也觉得高晓声的“政治”内容不是偶然的。他 1980 说过一段话，大意 是：文革的责任不能限于四个人，哪怕加了林彪，康生，等等也不能说明问题。问题恐怕是中国整体的问题，很多人参加了，包括我。刘宾雁也说过类似的话，说从 一个角度他很感谢被打成右派，否则他不敢保证在之后的文革中，他不会跟着主流一起去残害其它弱势群体。很少有人能反思到像他们这样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关于政治性是否会妨碍艺术性的这种争论，没有意义。这是一个伪命题，有时候有人试图利用这个问题引导作家在创作时去回避掉自己的政治良心。

南都周刊: 80年代你所喜欢的这些作家，相当一部分后来都流亡到了海外。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他们流亡期间的创作状况？在您看来，流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林培瑞: 流亡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比如海明威，他自愿离开美国住在欧洲和古巴。一种是不自愿的，比如80年代这批中国作家。至于流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觉得有利有弊。利是能保持独立性，比如哈维尔所说的“Living in Truth”，在流亡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达到；弊端是隔膜掉了自己的土壤和大部分读者。对中年以上的流亡中国作家来说，这问题特别大。苏晓康，郑义，和已经去世的刘宾雁都有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诗人北岛和多多也经验过。郑义和苏晓康继续写散文和评论，读者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文章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中国的流亡作家和政治思想家有个特点，基本上都不花时间去学英文。郑义、苏晓康，胡平，严家其，郭罗基，陈奎德、已过世的刘宾雁，王若望，等等都是例子（有的靠太太帮他们应付英文世界）。我提这一点不是批评他们，反而可以说是羡慕他们的精神。我觉得他们不学英语和寻根意识有关系，他们的根都在汉语世界里。他们想的、爱的，都是中国。这是很反讽的一个现象，这些非常爱国的人，最后都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说，他们就是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不得不离开。与那些腐败官员，在国内捞一大把再把钱送到美国来买房子，真是形成了一个极端的对比。谁更爱中国？

流亡的另外一个困难是生活压力，具体情况都很不一样，但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很拮据，这样就肯定会影响到创作所需要的时间和经济环境。

当然，英文好的例子也有，比如哈金，但哈金是出国前开始学的英文。90年代我第一次认识他，他的英文口语不算流利，发音也带“外国腔”。但每句话说得很准确，文法没有任何问题。他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美国人，甚至比许多美国作家都写得漂亮。这是鬼才，一般人办不到。

南都周刊: 金介甫认为西方读者对中国长篇小说的期待，受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现的很多畅销回忆录及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的影响，比如前不久在华盛顿去世的郑念女士写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郑念从一开始就提高了暴力的赌注，自从她的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前右派人士，就请人将他们家族的悲剧翻译成英文，寻找出版商，有时候英译本比中文原著出版得还要早。”您觉得金的这个观察和判断是否成立？

林培瑞: 介甫兄说得不错，但我不愿意责怪这种操作方式。这些人，包括郑念在内，之所以寻求海外出版管道，主要是因为国内没有正常的管道。有人批评他们“告洋状”，我觉得极为不公正。禁止告土状，难道只好憋着吗？哪儿都不吭声？也有人批评这些作家“卖国发财”，也是荒唐的。这些书的版税一般少得可怜。唯独郑念的书也许稍微多一点，但郑的家里本来很有钱，不需要这点小稿费。说她是为了钱写她的关于毛泽东怎么虐待一代人的真实故事，不但是诬告，是愚蠢之极的分析。

我理解介甫说的另一层意思更值得重视，那就是包括《生死在上海》在内，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大多是自传性质，没有一本像《日瓦格医生》那种堪称伟大的作品。80年代昙花一现的伤痕文学，是个好的开端但远远不够深，和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所经历的巨大苦难

不相称。

南都周刊: 是哪些因素在妨碍着这种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出现?

林培瑞: 首先可能还是时间的原因。古今中外的人类大灾难常常需要隔几十年才能得到成熟的文学反映。毛时代现在已经过了 30 多年了, 按说时间也够了。世界级的作品还没出现, 大概是因为创作环境不允许。比如和西德相比就不一样, 他们的作家在二战一结束, 就马上可以投入到沉痛反思的写作中; 即使和前苏联相比, 斯大林死后, 苏联社会开始了对斯大林时代的回顾与批评, 《日瓦格医生》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出来的。现在我看中国大陆作家对毛时代弊端的反思与抨击, 好像还需要绕着弯子说。这个气氛就很难了。无论如何, 中国当代文学还在等待着真正伟大的作品出现。

林培瑞：中国：吊灯里的巨蟒（社会）

原文链接: <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2487>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 你可能会因为同你的邻居谈论猫而被逮捕并受到迫害。中国话的「猫」(mao, 平声) 与伟大领袖的姓「毛」(mao, 二声) 发音相近, 偷听者将两个音听混了, 认定你是大不敬, 从而向警察告密, 这可能会毁掉你的一生。今天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 对于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 中国政府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了。民间生活的领域扩大, 非正式的话语比以前自由多了。尽管在报纸上仍没有讽刺性的政治漫画, 但大量充满辛辣嘲讽的笑话和顺口溜通过口头传播途径流传全国。其中有一些是直接挖苦共产党的(如:「不反腐败亡国, 反腐败亡党」)。另一些则指名道姓地讥讽江泽民、李鹏和其它高层领导人。

然而压制在中国依然是严重的问题, 并且压制的范围和方法仍很难被西方人理解。要想了解它, 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像过去一样, 首要的任务不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其它的为了全民的目标, 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因此, 它继续禁止对它的公开反对之声, 继续镇压在需要时它不能控制或不容易控制的任何组织。气功的命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八十年代, 共产党将气功作为中国的国粹和民族骄傲的象征给与鼓励, 中国政府甚至建立了一个全国气功协会, 将它纳入它本身的官僚机构中。但是到了九十年代, 当一些气功大师(法轮功的李洪志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 决定在共产党的控制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时, 本是中国国粹的气功一夜间成为「邪教」, 并成了残酷镇压的对象。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们(如今他们都在监狱里), 也是这一规则的牺牲品。他们的罪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中有「民主」两字(中国长期以来已有八个民主党派, 都附属于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的罪状是宣称他们的组织是独立的。

对知识产品的审查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模式。如今, 几乎甚么都可以在私下说, 这一点比毛的时代是大大进步了。同时, 因为学术刊物的发行量很小, 同其它的公开媒介相比, 学术刊物被给予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只要学者们不与最高领导层对抗, 他们就可以在学术刊物中相当多地按自己的想法发表意见。而且, 同 80 年代相比, 近年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写的东西更讨党的领导层的喜欢了。

但是，当一个知识份子真正想公开地表达一个在政治上有敏感性的观点时，他则要冒一定的风险。与过去一样，冒险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勇气的问题（尽管勇气是十分重要的），找到盟友或支持者来分担风险也很重要，采用间接的方法，如假名、中间人或隐喻的表达方式也能有效地降低风险。甚至连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如「中国六四真相」的资助者，都选择一种间接的方式面对公开场合。

尽管同邓小平时代相比，在江泽民时代，压制的范围趋于缩小，但它的主要的方式并没多大改变。这些方式具有中国特色，与其它国家（比如前苏联）的作法不同。前苏联定期出版手册，在上面列举出那些触犯了禁忌的词语。它还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来负责审查工作。中国从未有过同样的机构或手册。中国共产党丢弃了这些呆板的方式，而喜欢采用一种主要依赖自我审查的心理控制系统。所谓的风险(如离规则多远，说到甚么程度，同谁站在一起，等等)都是由每个作者和编辑来判断的，而且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或下意识里起作用。当然，有形的惩罚还是存在的。如果你冒险过分，你可能丢掉你的工作，可能进监狱，甚至于在脑后挨上一枪；如果你住在海外，你可能会被迫同你的家人和你的故乡断绝联系。

但是，一般说来，审查并不直接导致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它导致的是一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恐惧感。我所说的恐惧感，并不是指一种明明白白的、时有所现的、惊惶失措的感觉，我是指当人们同中国审查制度打交道时，早已习惯的一种隐晦的、深深的忌讳，而这种忌讳已经和他们的思想融为一体。然而，这种恐惧感的控制力量有时候还是令人吃惊的。

局外人很难理解这种审查制度的模糊性。举例说，去年两位社会学家，高瞻和李少民，一个是合法美国居民，一个是美国公民，到中国去作学术访问时被捕，被指控为间谍，因收集内部文件而被判刑。然而具体的细节并不清楚。他们到底作了甚么？他们跨越了哪几条界线？政府怎样定义间谍罪？为甚么这两个人因为收集内部材料（内部材料有很多种，有一些可以在书店里公开买到）而被捕，而许多其它的国内外学者在作同样的事情时却安然无恙？

在高瞻和李少民的事件中，对这些问题却找不到明确答案。但这种模糊的指控并非今天才有。这种模糊是有目的性的，并且几十年以来成为中共审查制度的基本工具。对审查者来说，模糊具有以下四种长处：

1. 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恐吓更多的人。如果我像高瞻一样，是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当我不知道她为甚么被捕时，被捕的原因就可能是她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我做的事情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开始撤退，（其结果是：许多人会检查他们自身的行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当我知道高瞻到底是因为甚么而被捕的，我就可能会很肯定我的工作没事的，或者，如果有甚么问题，可以立即解决。（结果是：只有很少的人退缩不前了）。透明是审查制度用来针对某些个别的行为时才使用的。当审查制度想恐吓许多人时，模糊更有用得更多。
2. 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其它许多活动。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甚么，我就会在方方面面面对国家的禁令多加注意。这个机制在自 50 年代以来中国的历次文艺和社会运动中都使用过。谁能，或者可能，说清楚「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词语的真正含义？（长头发是「精神污染」吗？多长的头发才是「精神污染」？为甚么一些人因留长发在 80 年代受到惩处，而另一些人的头发和他们一样长却没事？等等）。对关键词语的定义故意地含混不清，只有负面含义才是不可置疑的。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甚至自己成为审视自己行为的警察。

3. 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在逼供中尽可能多地有所收获。当李少民被捕时，他向抓他的人询问被捕的原因，回答是：「你自己明白。」李少民必须在「招供」中「态度诚恳」而获得「从宽处理」。这是个标准的词语游戏。警察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你的罪行的详尽的信息，审讯你的目的不是获得信息，而是通过你在口供方面的表现考验你的诚意。实际上，这通常是个谎言。实际的目的是榨取新的信息，用来针对你或他人。透明的指控明显地会破坏这个审讯策略。
4. 模糊的指控能允许掌权者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的领导喜欢掩饰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中，领导的面子代表了他的德行，而德行则是政治前途的基础。因此一个人将自身的行为粉饰的既合法又合乎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当领导的道德败坏时，这种粉饰的需要就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模糊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法律对这些领导就非常有用。比如说，「禁止搜集内部文件」这个规定固然存在；但同时，有些内部文件是很容易得到的。而且，有许多人搜集这类文件。这种情况就允许掌权者用书面规定逮捕高瞻、或李少民、或其它任何人，鬼才知道甚么原因，同时用一种准备好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他的滥用职权。中国宪法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弹性。宪法里说公民具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但在宪法的导言中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矛盾的两极间有著巨大的空间，使得领导者很容易滥用职权并使之合法化。（随便提一句，这两个端点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的现实情况。）

但是，北京对海外学者的管制，最触目惊心的，并不是众所周知的高瞻、李少民、吴建民、徐泽荣等著名的例子。管制的影响远比这些个别的事件更为严厉。大量的被管制情况从未被披露。康正果在「纽约书评」中写道，「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回国后被叫去谈话，在谈话中警察用不同方式警告、威胁他们（「你还想再回中国吗？」「你希望你的亲朋好友都过得好吗？」）。警察也特别警告这些人回到西方后对这类威胁只字不要提。（「不要随便开口」；「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正面形象」等等）。我无法证实康的「成百上千」的「回国谈话」的估计是否准确，但我已经注意到，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近年来已有十来个这样的故事。

举个例子来说，我认识一个女性，是一个知名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家。她生活在西方，最近用假名回中国探视她生病的母亲。（使用假名回国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是很常见的）。当她回到家乡后，警察知道她是谁，也让她心里明白他们已知道她是谁。在她的「回国谈话」中，双方都假惺惺地玩著一种语言游戏。在一起喝茶和吃点心的同时，威胁警告被传递给这位妇女，但双方却都假装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交活动。回到西方后，她还要遵守某些规矩，其中一个就是不能透露她曾受到威胁。

除了一部份中国人直接受到这种威胁外，更多的人是间接地感受到这种胁迫。因为有一些人被威胁要遭到流放或让亲属遭殃，更多的其它人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就会相应地审查自己的行为。2001年夏天，在高瞻和李少民被捕后，取消去中国做研究访问的海外中国学者的总数大概达到了高潮。在一所著名大学中，一个年轻教授取消了去中国做研究的计划，尽管她所做的是关于唐朝（公元 18—907）的研究。她并不是认为她的研究课题本身会有麻烦，而是因为她不知道甚么样的行为才是会引起麻烦的。会不会因为你是某人的朋友？会不会是因为你的访问路线？在这样的事例中，活生生的直接的恐惧感并不多见。审查自己只是一种较理性的措施。随著时间的推移，威胁和禁锢变得正常，甚至变得自然而然了。大部份中国人在政治的道路上行走，不太过问路上的一切大石和深沟，只是绕过这些阻碍，尽量减少麻烦。相比之下，持不同政见者在提出问题来，或者说点原则道理时，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他有

点傻，甚至他自己讨麻烦，活该吃亏。

外国汉学家也受到影响。例如，在 1999 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以后，一家重要美国新闻机构邀请一个在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做一次电视访谈。这个学者是个美国白人。他拒绝了邀请。他不想公开讨论一个敏感政治话题，怕失去进入中国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不讨中国官方喜欢的外国人可能会遭到拒发签证的处罚。即使被允许进入中国，也会在访问和查看资料时受到拒绝。他并没有受到特定的威胁，但他完全自愿地选择屈从于影响海外中国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则。（无论是不是中国人，一般不会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威胁。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些美国人因参与了写作、整理《中国六四真相》的工作都被中国领馆拒签。他们中的一个人询问被拒绝的原因，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官员的信。信中说，他无法帮忙，因他「无法向有关部门保证你会因参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而作出适当的道歉，从而获得你的签证。」在这个事件中，具体目的显然是要抹黑一本当局讨厌的书。）

我们很难把握和判断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以及自我审查会有怎样的结果。对那些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而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复杂。因为他们需要同中国官方保持联系。自我审查的效果很难掌握，不光因为人们不愿意提及（没有学者愿意承认搞自我审查），也因为主要作用都是心理上的，有时是非常微妙的。关键的作用发生在人脑的深处，甚至学者本身也可能没意识到它的发生。

我说这些不是想毁誉我的同行们。多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国政府宣称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莫名其妙地总要产生一种很强硬的心理障碍。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当代问题的汉学家中，「台湾独立」这个词本身就都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含义。同样地，讨论人权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触及中国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跟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那些长期以来牢牢谨记这些禁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最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违犯这些禁条不光会显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禁锢起初并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党」性很强的。

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是更像屋子中间的大枝形吊灯里趴著的一条巨蟒。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蛇静静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地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前苏联推行斯大林的「灵魂工程」的设想。而在实践中，前苏联的做法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

多年来，这种威吓只是针对中国公民。但现在已经波及海外。随著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多（中国加入 WTO 后会更加增多），其它国家应该关注这个现象。在中国和其它国家更需要互相传递可靠的信息的时候，审查和自我审查起甚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是唯一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很少西方人学汉语的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今天学英语的中国人与学中文的美国人的比例是几千比一）。但不管有多少别的因素，中国的审查制度的角色无疑是有害的。它歪曲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歪曲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纽约的世贸中心被摧毁后，一些中国人（主要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男性）在互联网上

叫好，对著燃烧的高楼欢呼。随后，二十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谴责了这种反应，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应的原因。他们十分注意地遣词用句，写道，「(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新闻传播和教育观念的误导」。他们是指邓小平政权在九十年代初为了挽回因天安门事件而崩溃的声望，大力推行民族主义，并开始将美国形容为狂妄自大的霸主。媒体声称是美国挫败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希望，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是美国企图「压制」一个正在升起的中国等等。这些渲染性很明显的报导不一定代表作者个人的实际认识。炮制和传播这些描述的中国记者们也生活在吊灯里的巨蟒之下。他们或许同意、或许不同意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或许是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过自己的报导是否代表自己的真正认识。他们的报导并不是那些中国年轻人对世贸中心摧毁后欢呼的唯一因素。但是，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另一方面，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来说，中共的审查制度带来的影响不容易衡量，但可能还更深远。学术界受的影响比新闻界大。当一个美籍华裔学者取消了对中国的考查访问，从而自己对中国的社会或者经济的研究，乃至中国的唐代的研究，受到限制，从近期或长期来讲，损失有多大？当某些问题被回避了，或者不能公正坦白地写出来，西方公众得到的信息会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全国较权威的教授决定不要上电脑把他的学问分享给大众，公众只能从其它渠道听取并不准确的答案，损失到底有多大？

同样的问题也影响国际商业事务。学者、记者和海外中国人受到要切断他们与中国联系的威胁。对商界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被排除在中国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之外(对于这个市场，从 19 世纪以来，西方就怀著很大的希望，虽然这些希望一直没实现，到今天国际商界并不灰心，继续感到吸引力。对商业的威胁，比对学者的威胁还更有效，而且更隐秘。

例如，李少民在中国被捕后，普林斯顿大学(李在那里于 1988 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教师们敦促校长给中国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对待李少民，校长照办了。与此同时，一些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他博士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七年)的前同事，请求他们的公司也加入敦促释放李的行动中。这些同事从公司的公关部门收到了简短的回覆：「我们感谢您对本事件的关注，但我们认为本公司积极地参与此事，是不合适的。」

这种屈服于北京的反映是很常见的。去年，一个顶尖国际投资公司的分析家发表了一份对中国石化总公司的财务报告。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现在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上市。中国官员发现这份报告相当负面，因而要求道歉。两名这家投资公司的执行总裁以及该报告的作者只好不情愿地去北京致歉。那么，下一次，这个分析家还能写他所看见的真实情况吗？

章家敦，曾任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的律师，多年来致力于将美国的企业介绍到中国。章渐渐习惯了一个较明显的双重标准，即，西方人私下谈论中描述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样子(充满了腐败、坏账、三角债、官僚作风，法律无法执行，工人不满，甚至示威的现象很多，比外面所知道的多多了。)，但同是这些人，在公开的报告中写的中国经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语言是温和的，信息性不强，而且通常是比较乐观的)。1999 年底，章终断了自已的律师职业，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即将崩溃的中国》。在这本书中，他引人注目地对那些关于中国前景繁荣的乐观预言提出了反驳，同时公然蔑视了不能在公开场合坦白地进行讨论的禁忌。章已经决定从法律界引退，这可能也是无奈的：章说：我不能再在一个大事务所做事了，因为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认识许多律师，

都是优秀而正直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批评政府，除非是在私下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现在不会聘用我了，我也不想将他们置于不得不说「不」的地步。

这段话能够说明吊灯里的巨蟒到底能够放出多少能量来了。它不仅使学者们放低姿态，商人们不敢放言，律师们小心翼翼，甚至于连章家敦这种愿意揭露真相的知情人都能「理解」。对于那些正在避开问题的人，他敬而远之，免得给他们带来麻烦。林培瑞亦然。为甚么我在上面的文章中有点名说我那些取消去中国访问的学者朋友们是谁？没有透露那位拒绝在美国夜间新闻上露面的朋友是谁？没有说那位为了能继续回家而不敢说出真相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巨蟒通过我的朋友们来到我面前，我投降了。这一切是如此微妙，掩饰著人在蟒下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有时候有人真是很高度地紧张。至少会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在本文中提到了他而会大不以为然，尽管是以匿名的方式提。（我自己倒不认为这种提及是对他有害的，否则我不会这样做）。在那个投资公司迫使它的分析家去北京道歉的事件中，我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是因为我不愿意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即使我对事实毫无疑义。巨蟒置身于法律之外，它能够驾驭法律去针对他人。由此可见，巨蟒的力量甚至能延伸到此时此刻，意即限制鄙人与您，亲爱的读者，之间的勾通。

冉云飞：哀悼不是表演（社会）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65043.aspx>

中国是个灾难频发的国家，但无论看上去是天灾还是人祸，总归是骨子里的人祸所造成的。地震当然是天灾，但民众有些生命财产的损失，却是因为人祸所致，比如说豆腐渣校舍。在 5.12 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后，官方传媒说灾区都搞了拉网式的地质灾害排查，以便制止次生灾害的发生。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拉网式地质灾害调查，只不过走过场做秀而已。因为从目前灾区周围频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如泥石流，对民众生命财产的伤害来看，根本就没有起到应有的预防作用。舟曲及绵竹、汶川等地震灾区范围内频频发生的泥石流，说官方对地质灾害的防范完全是空谈都不为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民众生命财产的情形呢？那就是因为民众没有办法制衡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

既然漠视民众生命财产，各级政府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自然根本就不在乎死了多少人。众所周知，像 5.12 大地震、玉树大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因此受到惩罚，没有任何一级政府因此背书，这说明天灾之后的人祸根本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频繁发生的人祸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这便使得官员们更加肆无忌惮，形成对民众生命财产漠视的恶性循环。由于对民众生命财产严重漠视，因此所有所谓的事后补救，都只是杯水车薪，何况根本无法防范下一次灾难的发生。当漠视民众的生命财产成为习惯以后，那么所谓的全国性哀悼，只不过是典型的猫哭老鼠——假慈悲，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中国发生的灾难有一个与外国不同的特点，就是每次灾难发生后，你都可以看到人祸的影子。不特如此，灾难发生后的处理方式，可以让人明显地感到人祸的影子。人祸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宣传部明目张胆地下令不准新闻媒体进灾区采访，即令一时半会儿没把那些前往灾区采访的媒体堵回来，也要他们尽量采用新华社等官方非常认可的媒体的通稿。5.12 特大地震后的前半月，媒体的采访相对自由，曝出了许多问题，因此后来发生的玉树大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等，官方就干脆禁止媒体到灾区采访，只允许在他们看来听话的少数媒体前去

做非常不全面的、也不透明的所谓报道，来敷衍民众。像最近发生的舟曲特大泥石流，和 5.12 大地震、玉树大地震一样，其具体死难数字令人生疑。因为没有死难者名单，没有死难者应有的基本信息，如年龄、地址等，再加上没有媒体的全面报道，抽象的死难数字，其权威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

在没有死难者确切名单及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从 5.12 大地震开始，到玉树大地震，再到今年八月份的舟曲特大泥石流，举行了三次全国性的对死难者的哀悼活动，令人愤懑不快。我赞同任何无辜的死难者都应该得到悼念，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死难者的名单及其基本信息，那么这种悼念就会流于形式，成为转移灾难视线的一种手段，更成为官方自我表扬的一种工具。在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哀悼日上，念出来的都是少数最高领导的名字，而不是那些不该逝去的亡灵，这样的哀悼是何其吊诡而虚伪！哀悼日没有遇难者什么事，倒成了执政者自我表扬和吹嘘的舞台，成了那些被洗脑的民族主义者喊“加油”的日子，更成为被官方组织起来或者默许游行来显示其有游行自由的一个场所，从而在爱国主义的大氅下暗渡陈仓，使灾难变成一场表演，无辜的死难者最终成为被悼念的道具。生前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做人尊严，就连死后无处安放的尸体和灵魂，也成了被官方利用的道具，真可谓生也何苦，死亦何哀！

中国灾难频发的密度之大，大小灾难层出不穷，就像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每天都是六四》一样，每天都应该是哀悼日。并不是任何人的死难，都能够得到官方表演式的哀悼的，当你作为很多死难者的抽象数据的一员时，你才有这样被拿来利用的价值，你才会得到全国性哀悼的“殊荣”。但是你的灵魂是否安稳，你的家人是否受煎熬，是否能更好地防范将来可能的灾难，这根本都不是官方所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便进一步地在政府运营中，劫掠他人的利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个根本不尊重民众生命财产和政府，在没有真相、没有死难名单情况下的所谓哀悼，根本毫无诚意，令死者不安、生者受伤。当民众的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都成为政府表演舞台的时候，这就注定灾难层出不穷、永无止息。

2010 年 8 月 19 日下午于成都

刘瑜：告别印象主义（杂谈）

原文链接：<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621>

胡适真是个小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

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以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一切学问往往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 Inglehart 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 01 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 1000 个随机受访者里有 65% 不同意，美国才 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 74% 不同意，与美国 78% 的数据相差无几。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亦属正常。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 12 县的调查发现，这 12 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 60% 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 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去改造。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数据可靠吗？不可能。好吧，人家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你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要不比谁的风衣更飘逸也行。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宣布胜利。“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量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21 世纪的民主本能（政治）

原文链接：<http://yyyiiiii.blogspot.com/2010/07/21.html>

原文：[The democratic instinct in the 21st century](#)

译文：21 世纪的民主本能

来源：《民主杂志》2010 年 7 月刊

作者：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译者：@Ytblf

校对：@Freeman7777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 2009 年再次当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总统。2010 年 4 月 12 日，两年一度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Assembly of the 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第六次会议。这篇文章摘自苏西洛总统在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我谨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致以热烈的欢迎。世界民主运动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次聚会令人印象深刻。我对大家不懈地推进民主事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赞扬。

我们相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数量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经由不同路径，民主国家在世界各地如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涌现出来。这一波民主浪潮也于 1997 年席卷印度尼西亚，变革使我们受益匪浅。

结果，世界的政治图景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战略性地缘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在亚洲，几十年前日本曾一度是该地区仅有的民主国家。但是今天，亚洲已是许多民主国家的共同家园。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并行不悖的另一种趋势：即民主国家的不幸——军事政变、政治动荡、宪政危机、两极分化、暴力冲突、向威权主义复辟以及失败国家。

我确信，这些倒退充其量只是暂时现象。民主——正如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在自身经历中所深刻体认的那样——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从来不是线性的。它常常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痛苦过程，充满跌宕起伏。所以不要绝望。我相信，21 世纪的本

能最终是民主的本能，并且 21 世纪的民主本能将不可避免地比 20 世纪的民主本能更为强大。

这是因为世界将更多而非更少地被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所席卷。全球化正带来更强的流动性——人、货物、服务、信息以及思想观念。国家、社区、家庭以及个人将更加频繁地相互接触。繁荣将持续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将持续壮大——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迈入中产阶级行列。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力量及自信心的增长，中产阶级最终会在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方面寻求更大的透明度及问责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能够忽视这种诉求。对这些体制说，要么适应它以求生存，要么反对它走向灭亡。

令人惊讶的快速转变

无论人们对捉摸不定的“民主”一词如何界定，我都毫不怀疑未来属于那些积极拥护多元主义、拥护开放和自由的人们。我这样说是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印尼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满足于呆在专制体制的“舒适地带”，不计代价地追求稳定、发展和国家统一。

当时我们认为印尼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民主不适应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民主会带来国家倒退而非进步。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被迫走上一条异常狭窄而僵硬的道路。威权主义的确定性被认为胜过民主的不确定性。

但令人惊奇的是，印尼人很快摒弃了这种看法，迅速转变了思维倾向。是的，在民主变革的方式和速度上，我们经历过喧嚣式的自我反省和嘈杂激烈的公共争论。但自 1999 年首次举行具有变革意义的自由选举 10 年以来，民主在印尼已经不可阻挡，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视民主为给定的事物、为自身的权利，而且日益将自己当做政治体制的主人。

这表明，印尼人内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冲动，这种内在动力需要适当时机被激发出来。同时还表明，个人和社区一旦品尝过民主实践和实际做出个人选择的滋味，他们就会紧抓不放，并且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简言之，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民主本能。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验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几十年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和政治环境中：暗示我们只能在民主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二者不可兼得，非此即彼，”他们说。许多年来我们相信这种说辞——果真选择了经济发展，放弃了民主。

我并不想对我的前任作出预判。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上述情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不复存在。今天，我们的民主体制日益稳固，同时在 G20 国家中印尼的经济增速位列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被迫在民主和发展之间作出抉择——二者可以同时获得！并且我们做到了二者兼顾！

联想到十多年前人们对印尼发出的世界末日般的预言，我们的民主经验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在印尼刚刚踏上民主道路时，国内外充满质疑，认为我们会失败。当然了，有什么理由不失败呢？当时印尼完全乱套了：经济总量下降 12%，种族暴力甚嚣尘上，东帝汶（East Timor）分离出去，恐怖炸弹遍地开花，宪政危机连绵不断。在 1998 年到 2001 年期间，我们经历了四任总统：苏哈托（Suharto）、哈比比（Habibie）、阿不都拉赫曼·瓦希德

(AbdurrahmanWahid) 以及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 (MegawatiSukarnoputri)。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Friedman) 将印尼比作俄罗斯，称之为一个“混乱的国家——庞大臃肿而运转不灵，异常重要而失败不起”。许多人预言，东帝汶分离之后的印尼将会四分五裂。一些人甚至言及我们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

然而上述怀疑经证明是错误的。印尼的民主日益巩固，三次全国大选和平地如期举行，分别是在 1999 年、2004 年和 2009 年。秉持民主精神，我们和平地解决了亚齐争端，顺利地推进巴布亚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我们将保护人权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大刀阔斧地推进分权改革。印尼没有倒退，而是在进步。¹

这里，宝贵的经验在起作用：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恶劣，无论社会变化如何急速、不可预测，民主国家都能顺利度过难关。这是一条上升的路。希望永在，我们不可轻言放弃。

值得牢记的是，印尼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轻易走上另一条发展路径——螺旋式下降，最终分崩离析。我个人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引导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但同时我也清楚，这并不仅仅是运气。民主得以运转需要的是信念、纪律、果断以及创造性的随机应变。

我们所汲取的一条关键性教训是，民主必须与良好的治理相结合。在民主转型早期，这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沉迷在对新拥有自由的陶醉之中，而这种沉迷时不时对政府治理带来损害。在一些地区，民选领导人治下的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更加严重。很快，我们认识到民主并非一剂万能药。仅仅依靠选举并不能自动解决长久以来的贫困、腐败、分裂以及失业问题。领导人如果长久沉溺于民粹主义话语而不能带来所欲求的发展成果，最终伤害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人民。

就印尼的民主转型而言，也只是在民主与良治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增进国家统一，解决矛盾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本次大会就“民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带来实惠”展开讨论异常重要的原因。怎样才能选举产生更优秀的领导人？如何保证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腐败？如何确保民主产生负责任的、积极回应的政府？

民主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选举权，更在于为公民提供更佳发展机遇的愿景。当我们试图达到此目的时，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良治既非民主本质，也非民主专有。非民主以及半民主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出良治。每一个——我指每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去努力赢得实现良治的珍贵声誉，而不应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坦率地说，印尼民主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挑战是如何将“金钱政治”降到最低限度，并最终将其抛弃。我明白，即便对许多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来说，这都是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金钱往往与政治如影随形，其方式五花八门。但金钱政治会严重损害民主体制，因为它诱使民选领导人和政客为其主子服务，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它导致一种虚假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悖逆公众信任，践踏民主理想。金钱政治越盛行，民众意愿越受忽视，民主受损越大。毫无疑问，对印尼民主体制来说，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打击金钱政治都将是一个挑战。

印尼民主得以运转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从过去汲取了一条惨痛教训：那就是国家的未来必须立基于制度和规则，而非领袖个人。当然，历史充斥着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但依赖领袖个人力量的政治体制将益发难以维持。正像印尼所两次经历的那样：政治强人下台后，整个制度也随之崩溃，因为制度仅仅是领导者的个人镜像。因此，我倾向于将政治强人定义为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能力发展出一套持久稳定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对印尼民主发展来说建立持久性制度极端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过去十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定期选举保证了政治问责制及权力的和平交接。总统办公室不再是曾经大权独揽的全权执行机构。军队和警察不再干预政治。我们有一整套制衡机制。议会充满活力且完全独立，司法部门亦然。这些机构之间的宪政关系都有明确界定。法治在印尼至高无上。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人可以频繁交替，整个体制却必须岿然不动，民主也必须持续向前。真的，当 2014 年结束第二任任期之时（真主啊，我很乐意），我希望国家事务一切如常。那将是民主在进步的一种标志。

源自内部的变革

我们的民主得以确立的一大原因在于它完全是内部生成的。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非发自内部或者不能激发国内民主化能量的民主国家无法持久并将经历政治退化。是的，印尼的民主始自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当时的金融危机源自国外。但是铲除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以及裙带关系的意愿却完全源自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源自国内。重建印尼的决心同样源自国内。这些因素并非外部强加，而是印尼人民的真实意愿。

当然了，我们一直保持心胸开阔，四海宾朋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民主试验的利益攸关者最终还是我们自己。成功抑或失败都系于我们的作为或不作为。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印尼民众认为国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行进，这个很能说明问题。也许他们不认同执政党或反对党，也许他们对政府的政策持批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打心底相信民主体制在起作用，并且对此充满乐观。对印尼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这个非常令人鼓舞。这是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意味着只要信任民众你就会无往而不利。如果过去十年印尼所经历的三次大选教会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是：选民远比大多数政治家所认为的要睿智得多。

政治家也许会诉诸选举舞弊，欺骗愚弄公众，煽动仇恨情绪，诱惑选民走回头路，或者向选民承诺一切。然而选民最终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投票站负责、审慎而理性地投出选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幕正在普遍上演，而与选民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无关。

因此，如果说印尼在最近的历史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也是因为决断权掌握在以极大审慎行使该权力的善良民众手中。在过去的三次大选中，民众大量地参加投票。即便投票是非强制的，而且复杂的投票程序要求选民几个月内频繁去往投票站，但印尼民众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投票率。选民们明白，在其选票与国家未来之间有着确定无疑的直接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最令人痛心的挥霍是对民众授权的挥霍，而最为珍贵的财产是公众信任”的原因。相信我，一旦失去这种信任，你将永远无法复得。

事实上，我将民主发展视为一个扩大人民机会和向民众赋权的持续过程；一个促进性别平等、更多妇女得以参政的过程；一个持续关注边缘群体的过程；一个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

寻求全国共识同时避免多数暴政的过程。民主发展寻求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是利益攸关者。

对印尼这样极为多样化的国家来说，民主发展绝非仅仅意味着促进多党民主，它还意味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多种族民主社会。伊斯兰教、民主制以及现代性可以共生共存，这一点我们印尼人已向世人作了展示。穆斯林信徒对安拉的宗教义务、其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公民所负有的公民义务以及他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的能力，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这方面印尼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伊斯兰政党是民主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么做，这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种存在于印尼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有的温和、开放以及宽容是 21 世纪世界秩序的火种，这种秩序以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为标志。令人悲伤的是人类运气不佳，没有一个世纪不充满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竞争。但 21 世纪将会有所不同，其无须也不必成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纪。21 世纪可以具备这样一种鲜明特征：全球良知浮现、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共同努力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大业。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次大会“跨文化团结”这一主题表示赞赏的原因。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立足文化团结共同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从而将 21 世纪打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佳世纪。

译注：1、亚齐争端：亚齐是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一个地区。1949 年印尼脱离荷兰独立后，亚齐分离主义者认为亚齐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尼。经过近 30 年的流血冲突，2006 年印尼国会通过《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地方政府更大自治权，结束分裂，实现了和平。

相关资料见 [Wikipedia](#)